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人的国民性

Arthur H. Smith

又名《中国人气质》

[美] 亚瑟·史密斯 ◎ 著

张梦阳 王丽娟 ◎ 译



中国社会顽疾的诊断书

120年前轰动全球的汉学名著

一本让你哀叹、愤怒、自省的奇书



中国长安出版社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中国人的国民性

(又名《中国人气质》)

Arthur H. Smith

[美]亚瑟·史密斯 ◎ 著

张梦阳 王丽娟 ◎ 译



中国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人的国民性 / (美) 史密斯 (Smith, A. H.) 著 ;
张梦阳, 王丽娟译. — 北京 : 中国长安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107-0624-0

I. ①中… II. ①史… ②张… ③王… III. ①民族性
—研究—中国 IV. ①C955.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3932号

(上架建议: 文史·社科)

中国人的国民性

(美) 史密斯 (Smith, A. H.) 著
张梦阳 王丽娟 译

出版: 中国长安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14号 (100006)
网址: <http://www.ccapress.com>
邮箱: capress@163.com
发行: 中国长安出版社
电话: (010) 85099947 85099948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8
字数: 195千字
版本: 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7-0624-0
定价: 38.00元

序

唐弢

继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后，威廉·莱德勒和尤金·伯迪克合写的《丑陋的美国人》（中文译名《困惑的外交官》）、高桥敷写的《丑陋的日本人》，也先后译成中文出版了。后两本书曾在《丑陋的中国人》里被提及，可以说是这类问题的比较全面的介绍，也是柏杨用以自辩的客观的凭证。听说问题还有争论，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可惜我没有读到有关文章。当然，以偏概全是不对的，不应当将个别缺点看成是全民族的缺点；但由于作者都是本国人，池鱼故渊，知之深而望之切，我禁不住想起鲁迅说过的话，鲁迅说：“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

这是问题的关键，他说得多好啊！

鲁迅翻译过厨川白村的书，对于厨川对“本国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的批评，“禁不住称快”；并且认为同是立国亚东，情形十分相似，因此厨川所狙击的要害，“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这是我们大可以借此深思，反省的。”看来这也是鲁迅之所以介绍《苦闷的象征》的原因之一吧，不过，倘有人以为鲁迅苛责自己，怀有民族自卑感，那就大错特错了。凡是别人加在我们民族身上的荒谬狂悖的言词，鲁迅总是不遗余力地给以反驳和狙击。在《马上支日记》里，在为内山完造的《活中国的姿态》所写的序言里，对于自命为“支那通”的日本人进行了嘲笑：“一个族行者走进了下野的有钱的大官的书斋，看见有许多很贵的砚石，便说中国是‘文雅的国度’；一个观察者到上海来一下，买几种猥亵的书和国

画，再去寻寻奇怪的观览物事，便说中国是‘色情的国度’。”至于安冈秀夫扬言江浙人大吃竹笋，是“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属于色情心理乃至生殖器崇拜的一种表现，鲁迅对这些胡说八道的“支那通”更是嗤之以鼻，引为笑谈。但对于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批评，不管谈话的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他总是认真对待的。例如在中国居住了二十余年^①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1845～1932）所著的这本《中国人气质》^②（*Chinese Characteristics*），他就以赞赏的口气一再提到它。

鲁迅认为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直到逝世前十四天，他在《“立此存照”（三）》里谈到辱华影片《上海快车》的时候，重申前请，希望有人将这本《中国人气质》译出来，以结束“安于自欺、并以欺人”的局面。他劝人们把史密斯的书当作一面镜子，“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呢？

鲁迅在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根据许寿裳的回忆，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高老夫子》、《肥皂》、《白光》，写《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弟兄》，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短小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的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他描绘了怎样的是中国人，另一方面，又暗示了中国人应当是怎样的，他开掘着，开掘着，直至掘到了中国人的灵魂。而我以为，鲁迅作品之所以深刻，就深刻在这方面：写出了人——

① 编者注：本书作者亚瑟·史密斯前后共在中国居住五十余年，截止1894年此书首次出版时，作者已在华居住二十二年。

② 编者注：本译稿在中国首次出版时，书名译为《中国人气质》，此次再版更名为《中国人的国民性》。

或者说中国人的一些内在的东西。

鲁迅没有全然同意史密斯的批评，并且说他“错误亦多”；但对有些意见却表示首肯，也许还有同感。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涉及“面子”的话，还可以从鲁迅的文章里找出许多来。史密斯批评中国人因循保守。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互相欺瞒。鲁迅说过：“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满足着，即一天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史密斯批评中国人不求甚解。鲁迅最讨厌的是那种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人，他说“假使有一个人，在路上吐一口唾沫，自己蹲下去，看着，不久准可以围满一堆人；又假使又有一个人，无端大叫一声，拔步便跑，同时准可以大家都逃散。真不知是‘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史密斯批评中国人知足长乐。鲁迅最反对的是那种自我满足、安于现状的人，他说：“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来的。以前早有路了，以后也该永远有路。”他反对知足长乐，认为“劝人安贫乐道是古今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为此以讽刺的笔调写了《安贫乐道法》。至于史密斯批评的中国人麻木不仁，更是使鲁迅痛心疾首的民族病根，他就因为在幻灯片上看到许多中国人围着欣赏自己同胞被人杀头的情景，这才中止学医的，鲁迅说：“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后来他在中篇《阿Q正

传》和短篇《示众》里，都曾形象地描绘了欣赏杀头的麻木而无知的群众的场面。此外，比如史密斯批评中国人浪费时间、提倡忍受、猜忌连坐、繁文缛节……也都可以鲁迅的文章里找到鞭挞的痕迹。史密斯同时讲了一些中国民族性的优点，如勤劳、节俭等等，显然，他批评的缺点有些也难以使人同意，鲁迅并没有全部接受它。

鲁迅曾称猛烈地攻击本国缺点的厨川白村为“霹雳手”，并认为他所狙击的实际上也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但他又说：“日本虽然采取了许多中国文明，刑法上却不用凌迟，宫廷中仍无太监，妇女也终于不缠足。”瑕中觅瑜，将两者对照一下，很可以看出他重视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从年轻时阅读它，到晚年仍希望有人将它译出的本意了。在我们眼前展示着一颗永远跳动着的伟大的心。

现在，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已由张梦阳等同志译出，并即将由出版社出版了。不仅鲁迅的期待得到满足，而且经过分析、自省，“明白那几点说得对”，正可以作为变革的参考。我赞成鲁迅的意见，不论有多大缺点，我们“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1988年4月12日

绪论

知情者出面作证，人们总希望他陈述真情，而且是全部真情，除真情之外，别无其他，许多接触过中国人的知情者，已经述说了中国人的真实情况，然而他们当中或许很少有人能够只讲真情，不掺水分，更没有人讲述过中国人的全部真情。任何一个人，无论他多么博学广识，都不可能了解有关中国人的全部真情。所以，这卷书里的论文，要坦然正视来自三个不同方面的异议。

首先，人们也许会说，谁试图把他关于中国人特性的印象转述给其他人，那么他将是枉费心机。乔治·温格罗夫·库克（George Wingrove Cooke）先生，一位伦敦《泰晤士报》1857至1858年驻中国的通讯记者，可以像那时到中国去的任何一位作家那样，有良好的机会观察各种条件下的中国人，并且能够得到那些资深望重者的帮助，借助那些人的观察获得对中国人的正确理解。然而库克先生在他书信集的前言中，对他描述中国人特性的失败表示了歉意：“在这些书信里，我没有采用精心描述中国人特性的文章。这是一个重大的疏忽。没有一个题目能有这样的诱惑力，没有一个课题像这个一样，能有更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可以充分使用精巧的假设、深刻的概括、堂皇的教义，所有末流的批评家，都可能断然地蔑视我，因为我未利用这样的机会，总结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事实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我写了几点中国人的优良特性，然而不幸的是，就在我写作这些文章的同时，眼前的中国人又以他们的言行粗鲁地违拗了我的假说，为了真实起见，我连续烧了好几封信。而且，我常和最著名而且坦诚的汉

学家们谈起这件事，发现他们和我一样，认为从总体上以一个观念概括中国人的特性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些困难仅仅是那些实际上了解中国的汉学家才感觉到的；一个玲珑的作家，对所写的课题全然一无所知，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一篇词藻华丽但却与事实正相违背的分析文章，虽然这种分析应该是严格真实，不附加主观臆想的。某一天，或许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必要的知识，抓住中国人心中每个稍纵即逝的矛盾心理，估价其在总体中的分量与影响。目前，至少可以满意的是，我避免严格的定性，只是用最突出的品性描述中国人（a Chinaman^①）。”

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人已经使他自己成为许多国家事务中的一个因素，可以看出，中国人是不能压服的；也可以感到，他们又是不易被理解的。实际上，除非在中国，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正确地了解中国人，然而依然盛行这样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是一组无法完全理解的矛盾体。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与中国交往的几百年已经逝去，我们终究没有明白地解释这样一个道理，为什么我们至今不能像认识复杂现象的其他秘密那样，真正认识中国这个民族。

对这卷书的另一个更为严肃的异议，是作者不具备写这书的资格。在中国生活了二十二年这个事实，并不能保证他有能力写书论述中国人的气质，就如一个人在银矿滚打了二十二年，并不足以证明他适于写作一篇关于冶钱或者金银二本位币制的论文。中国幅员辽阔，一个从未走访过她一半以上的省份，而只在两个省居住过的人，当然没有资格对整个帝国作出概括。这些文章最初是为上海的《北部中国每日新闻》（*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写的，无意广泛传播。然而，一些论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大不列颠、美国和加拿大都引起兴趣，作者应要求把这些文章重新编写成书^②。

① 原注：这是一件令人吃惊甚至遗憾的事情，“a Chinaman”这个粗野的词语似乎已经根深蒂固地植根在英语中，而把更恰当的词语——Chinese排除在外。我们不知道中国的外国刊物哪一个是不用“Chinaman”称呼当地人的，这个帝国的作家也没有一个坚持避免使用这一词语。

② 原注：《中国人气质》，于1890年在上海出版；在中国和东方广泛传播，两年前售空。

第三点异议，是一些人提出的，认为阐发的部分观点，特别是那些关于中国人伦理特性的看法，会引人误入迷途，产生错误判断。

然而，应该记住，人的印象不能如统计表那样，可以精确到分毫不差。它们就如相片底版，没有两张底版是完全相同的，可是每张都可以真实地映现一些其他底版无法呈现的图像。相片的底版不同，透镜不同，显影又不同，结果相片也就不相同了。

许多久居中国的人，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作者，他们与作者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另外一些人的判断也理应同样受到尊重，想来在一定部位增添一点儿更明亮的色彩，可以使过于单调的画面更为逼真。无疑，考虑到这些正确的意见，这本著作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增补。然而这次出版急迫，原本讨论中国人气质的三分之一篇幅被省去了，但是仍然保留了最重要的部分，并新写了“知足长乐”一章。

没有任何理由拒绝赞美中国人所具备并显露出的优点。同时，还存在另外一种危险，这就是屈从于既定的看法，给予中国人超过实际的道德荣誉——这是一种比不分皂白地贬低还严重的有害做法。由此联想到萨克雷，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在他的小说里，好人总是愚笨的，坏人却是聪明的。对于这个问题，这位伟大讽刺家的回答是：他有眼无心，没有深入思考眼见的事物。譬如有一幅橡树的木刻画，要求观察者从橡树的轮廓中发现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的侧身像，低头抱臂站着。但是长时间注视之后，往往看不出任何这样的侧身像了，似乎其中必定有错，而一经清晰地指出，就会感到看见画而看不出拿破仑是不可能的。按照同样道理，许多事情在中国每一次出现时，人们往往视而不见，而一经看出，便经久不忘。

把一个限制性的分句，引进所有概括性的总句是不可能的。需要提请读者注意的是，不要以为这些文章企图概括整个帝国，也不要以为是我国人观察和体验的全面荟萃。这些文章仅仅是一个观察者所得印象的记录，是许多种“中国人气质”中的一小部分。它们不是一幅中国民族的肖像画，而像是观察者根据自己的见闻，用炭笔勾勒的一幅中国民族一些特性的素描。图像仅仅是由单线构成，无数单线交织在一起，要求形成完整的白色

光幅。它们也可以看作是进行了归纳法的研究，书中所讲的许多特性不仅仅来源于作家个人的经验，而是形形色色的人们在各种各样的时候所得经验的总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论题得到了如此广泛的例证。

梅多斯（Medows）先生，众多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中最富于哲理的一位，就表达过这种意见，把一个外国民族精神的正确观念传达给他人的最佳方式，就是交给他各种笔记，让他细读。这些笔记详细记录引人注目的大量事件，特别是那些非常事件，并附以该国当地人对这些非常事件的说明。

一个总的原则是从丰富的大量事例中推论出的。这些推论可以被怀疑或否认，但是这种被引用的事例却不能置于一边，唯一的原因是，它们达到了充分的真实度，任何关于中国人特性的理论最终都要参照这些事例。

试图对中国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进行比较研究的人，最强烈地感到其中的困难。显然，许多似乎是中国人“气质”的东西，纯然是东方人的特性；然而这一点究竟真实到什么程度，每一位读者都必须从切身经验出发作出自己的判断。

在现阶段，我们和中国人的交往中，有三条了解中国社会生活的渠道——这就是研究他们的小说、民谣和戏剧。这些知识来源无疑有其价值，但是似乎还存在第四个，比前三者加起来还要珍贵，不过这个源泉不是对所有研究中国和中国人的作家都开放的。这就是在中国人自己的家里研究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就像在农村比在城市更易于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图那样，在家庭中更易于了解人的气质，一个法国人在中国城市住上十年，所获得的关于人民内部生活的知识，或许还不如在中国村庄住上十二个月得到的多，仅次于家庭，我们必须把村庄看作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基本单位，这本书里的文章就是以中国村庄为立脚点写成的。其目的不是企图表达一个传教士的观点，而是作为一个没有成见的观察者，朴实地报告他的所见。由于这个缘故，没有作出中国人的气质可以由基督教进行改造的推论。并不假定中国人全然需要基督教，但是假如他们的特性中存在严重的缺陷，那么如何疗治那些缺陷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如前所述，“中国人问题”现在已经远远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国际性的。完全有理由认为，到二十世纪这个问题甚至会比当前更为紧迫。对于用什么方法来改进人类中这样广大的一部分人的问题，任何一个希望人类美好的人，都不能不产生兴趣。如果我们得到的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将会得到至今被忽视的一系列论据的支持。如果这些结论是错误的话，无论得到怎样的支持，都将不能成立。

劳德·埃尔金（Lord Elgin）对上海商界的答问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是他的话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和中肯的：“当阻挡这个国家的障碍被搬开，可以自由通行的时候，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将发现它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存在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化，不过在其他方面又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同情和尊敬。在即将发生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必须在这个持怀疑态度而又聪敏的民族中奋力前进，所凭借的方式就是宣传升入天国的信仰，说明这种信仰与不离尘世相比，在公共和个人的道义上，都会提供更好的保证。”

编序

谈起国民性，始终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话题，对中国人而言，这甚至意味着一个不愿被触及的痛点。无可否认，一个人相对容易接受外界对其“后天修养”的质疑，但很难接受对其“先天不足”的指责，认为这是有意挖苦。也正是基于这一“人之常情”，这部“外人”的中国见闻之书曾被许多国人肆意嘲讽，其中包括清末民初的“中国第一奇人”辜鸿铭。

本书的作者亚瑟·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是以西方传教士的身份来华工作并生活的，但前后在中国居住的五十余年时间里，作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深入体验，对中国公益事业的人道主义努力，已远远超过了为上帝代言的时间。由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部《中国人的国民性》绝不是蜻蜓点水的浅淡素描，而是一次足以入骨三分的深度刻画。中国人到底是“美丽”的，还是“丑陋”的，作者并没有直言给予答案，而是以数之不尽的“古怪”现象发问，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皆配以西方世界的观点加以阐述，甚至给出了一些可行的建议，这令我们不得不赞叹作者的客观与公正性。

初读此书，第一感觉总觉得论据不够铁证如山，有些以偏概全的痕迹，但随着阅读的逐渐深入，就愈发被作者独到的观察力所征服。原来那些如此细微的小习惯，却如此清晰地暴露了中国人性格中存在的种种“病态”问题，而最终不得不承认的是，正是这些众多的小问题，在堆积如山后质变成了足够改变中国人命运的大问题，也逐渐被学界视为中国人的国民性。

自此书首次出版至今，已整整120年，而今年也恰恰是甲午战争爆发

120周年。悠悠岁月，百年狂澜，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我们是否需要沉思，这百年前被外族人指出的民族弱点是否早已不见踪影？亦或是有增无减？“面子”问题、繁冗而虚伪的“礼节”，还有可怕的“麻木不仁”，这些不正是造成当代中国社会道德危机频现的因由吗？

时过境迁，旧话新题，“素质论”与“制度论”的纠葛早已激辩了百年，中山先生“知难行易”的结论也已经不再鲜为人听，但是面对中国姗姗来迟的现代化，我们终究要回到民族性格里发问：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究竟看到了多少？看清了多少？常言“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正如自己的眼睛无法看清自己的脸颊一样，因此，“镜子”的价值就非同一般了。这西方人的视角，外族人的视角，也正是我们亟需的自我审视的“镜子”。在他们的眼睛里，在西方的这面“镜子”里，我们是否敢于承认真实的自己呢？事实早已说明，我们的民族确实缺少自省的精神，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自省的前提是自知，这便是这部《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意义所在。

回望中国历史，如果说有人将中国人看得如此彻底，那么此人定然是鲁迅先生，而再无第二人选。从鲁迅先生对于这部《中国人的国民性》的钟爱和三次极力推崇，便已可见此书绝非一般。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再版《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很有必要的，至少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细致审度自己有着难以言喻的作用。另外，本次再版特意加入了外文原版书中所有的老照片，这对于读者在视觉上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和行文缘由将大有裨益。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书英文原版名为《*Chinese Characteristics*》，是中国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张梦阳教授的多年心血译作，在此之前已有三次出版，此番第四次出版，特更名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既直指此书在中国引起的话题核心，也更加符合作者亚瑟·史密斯之本义。

如若此书能够带给读者新的省悟，新的思想价值，我们荣幸之至。

目 录

序 / 唐弢	1
绪论	1
第一章 面子	1
第二章 节俭	4
第三章 勤劳	10
第四章 礼节	15
第五章 缺乏时间观念	19
第六章 忽视精确	25
第七章 误解的才能	32
第八章 欺瞒的才能	38
第九章 柔顺的顽固性	45
第十章 智力混沌	50
第十一章 麻木不仁	56
第十二章 轻视外国人	61
第十三章 缺乏公共精神	67
第十四章 守旧	71
第十五章 不讲究舒适和方便	78
第十六章 生命力	91
第十七章 忍耐与坚韧	96

第十八章	知足长乐	103
第十九章	孝心	109
第二十章	仁慈	119
第二十一章	缺乏同情心	124
第二十二章	社会台风	139
第二十三章	连坐受法 互相牵连	146
第二十四章	互相猜疑	156
第二十五章	缺乏信	173
第二十六章	多神论 泛神论 无神论	186
第二十七章	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需要	205
译后评析		217
再版后记		260
三版后记		263
四版后记		265

第一章 面子

一看到“面子”这个词，就会感到再没有比这更悖理的了，居然这样称呼作为全人类一部分的中国人的一种“气质”。在中国，“面子”这个词，不简单地指人的脸，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集合名词，其中包含的意义，比我们所能描述或者可能领悟的含义还要多。

哪怕是部分地理解“面子”的意思，我们也必须注意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种族，具有强烈的做戏的本能。戏剧几乎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娱乐，中国人喜好戏剧，就像英国人喜好体育、西班牙人喜好斗牛一样。很轻微的刺激，都能使任何一个中国人进入戏剧，把自己当作戏里的一个角色。他像做戏一样装模作样，行磕头礼，屈下双膝，趴下身子，往地下叩头，对于这种情形，西方人即便不视为荒唐可笑，也认为是画蛇添足。中国人是按照戏剧方式思维的。一旦为了唤起自己的尊严，他对两三个人讲话，也像是面对一大群人，他喊叫道：“我说，这里有你，有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烦恼排解了，他会说自己是在荣誉和称许声中下了舞台，如果烦恼没有排解，他就无法下台，所有这些，只要看懂了，就要发现它们与实际没有任何联系，对中国人来说，永远不是事实问题，而总是形式问题。如果在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方式，讲了一番漂亮话，做戏的要求就满足了。我们并不进入幕后，因为那样将破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好戏。在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做出类似的戏剧行动就叫有“面子”。使他们失望，不理睬他们，打断他们的戏，就是使他们失掉“面子”。一旦正确领悟这个问题，就会发现“面子”正是打开中国人许多最重要特性